

坚持治理整顿 全面深化改革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宣传材料

大地出版社 人民邮电出版社

目 录

一、十年改革的历史性成就及其经验总结·····	1
二、改革是一场艰巨、复杂而深刻的革命·····	16
三、坚持治理整顿是深化改革的必要保证·····	22
四、改革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	36
五、增加农业收入 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46
六、优化结构 促进乡镇企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55
七、全民重视教育 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63
八、加快科技进步 树立科技兴国的观念·····	74
九、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完善企业经营机制·····	83
十、稳妥地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	94
十一、切实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104
十二、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	111
十三、降低经济速度 克服经济过热·····	117
十四、重塑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管理体制·····	124
十五、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133
十六、增加有效供给 克服国民收入超分配·····	141
十七、稳定发展经济 保持消费的适度增长·····	148
十八、保持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基本平衡·····	154
十九、在深化改革中促进长期资金市场的发育和形成·····	161
二十、强化宏观控制 治理整顿金融·····	170
二十一、完善财政机制 增强国家财力·····	178
二十二、平衡财政收支 努力完成1989年的财政任务·····	186
二十三、客观地分析1988年的物价形势 遏制通货膨胀·····	192

二十四、在治理整顿中努力克服重商主义·····	199
二十五、价格改革必须与市场体系的形成相配套·····	208
二十六、进一步完善投资体制 改善投资结构·····	218
二十七、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私营经济·····	228
二十八、在治理整顿中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237
二十九、总结历史经验 深化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	244
三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实现住宅商品化·····	260
三十一、提高工作效率 充分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 能·····	266
三十二、在改革和建设坚持自力更生、“双增双节”·····	274
三十三、加强廉政建设 根除腐败现象·····	281
后记·····	291

一、十年改革的历史性成就 及其经验总结

(一) 历史性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1979—1987年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5%，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农业和国民收入比前29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约高6个和3个百分点。1988年农业总产值增长2.5%，工业总产值(扣除村办工业)增长17.7%。经济增长在年度之间的波动幅度比以前减小，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得到改变，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利用比过去好。人均国民收入在1978年是315元，到1988年达到700多元，10年里翻了一番多。粮、棉、油、钢、煤、电的产量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大大增强了国力。因此，这10年是经济最活跃、人民群众积极性最高、国力增强最快、发展生机最旺盛的时期。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从1979年起的头3年中，我们基本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等比例关系，缓和了10年动乱给我们造成的经济紧张和失衡状态。1988年农、轻、重的比率从1978年的1:1.12:1.48调整为1:0.99:0.98。农业的比重有所下降，工业的比重稍有上升，物质性服务的比重开始上升。到1988年底，工业和物质性服务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54.1%和23.8%。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改变了过去几乎所有农村劳动力都

在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使 6 千多万劳动力从农业转到了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上来。整个社会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劳动力比重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结构得到了较大加强，电子等高精尖产业也有了可观的发展势头。

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束了以往长期的闭关自守状态，经济的对外开放度显著提高。1988 年进出口总额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 15% 左右，比 1978 年 5.2% 提高了两倍。1979—1988 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 26.4%，是前 29 年 7.7% 的 3.5 倍。同时进出口结构也有了改善的势头。1979—1988 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 463 亿美元。我国还设置了经济特区，在沿海确定了一批开放地带，为直接和间接引进外资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这些都说明我国正在从一个封闭型的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

10 年来，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是建国以来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首先，我们改变了过去重生产、轻消费的状况，一个重要表现是积累率从 1978 年的 36.5% 下降到 1982 年的 28.8%。1986 年的积累率虽然回升到 30% 以上，但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1978 年不过是 210 亿元，1988 年为 3798 亿元，积累率回升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是从储蓄转化而来的，这和过去的高积累不大一样。其次，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 1978 年的 133.57 元提高到 1988 年的 545 多元，增长了近 3 倍；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也从 1978 年的 614 元提高到 1987 年的 1451 元，增长 1.36 倍，1988 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 22.1%。第三，我国不仅已基本解决了人民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实现的温饱问题，而且城乡人民的消费结构还有了较大的变化。到 1988 年底，城乡居民的住房条

件明显改善，家庭拥有的高档消费品已经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老三大件转向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新三大件。第四，就业比率大大提高，在城市解决了5千多万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在农村有6千多万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有些发达地区已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苗头。

我们在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评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比一些东欧国家晚了许多年。然而，从1979年以来，进展是相当快的。我国已经开始了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否定商品经济的僵化体制开始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解决了农村经济中的“大锅饭”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基础上，发展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在全民所有制内部也本着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要求进行了改革，使国营企业有了一定的利润动机的自主权。

在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方面，改革了以指令性计划为核心的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指令性的计划指标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统配物资在1978年有256种，到1986年只留下20种。为了促进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育，进行了价格体制、资金分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的改革；通过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逐步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互相封锁。总的说来，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开始显示出重要作用。

在从直接控制向以间接控制为主的转换方面，缩小了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控制的范围，并从理顺经济参数出发，为经济手段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作了必要的准备。对扭曲的价格先后

进行了几次调整，提高了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主要原材料、燃料价格，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生产资料进入市场并放开了市场价格；对一些重要的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有选择地与国际价格相衔接；对税率、利息率、汇率、工资等其他经济参数也作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调整。这就使我们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控制。

（二）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

总结这个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首先是我们在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坚持了三个结合：第一，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这种结合的具体体现，它保证了新时期的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前进。第二，我们坚持了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搞活结合起来，既保证了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又避免了思想僵化、固守传统模式和自由化的倾向，保证了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第三，我们坚持了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发展其它经济形式、共同富裕与适当拉开收入分配档次结合起来，这就保证了我们在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能够按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我们坚持不懈地推行了从数量型到效益型的发展模式的转换。经过反复实践与探索，逐渐形成了与我国当前国情相适应的转换方式：第一，经济指导思想上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前提条件，而经济指导思想的转变首先取决于全党是否能够统一认识。因此，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着重批判了生产建设中的“左”的思想，其中特别是“重积累、轻消费”，“重基建、轻改造”，“重速度、轻效益”等一系列急于

求成的冒进思想和工作作风。以此为基础，在经济建设中逐步创立一整套新的经济指导思想，即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代替为生产而生产的发展目的，用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代替单纯追求增加产值产量，用内涵为主代替外延为主的发展方式，用平衡协调发展代替孤立突出重点的发展。第二，当我们将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指导思想有了统一认识之后，经济发展模式能否转换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应的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跟上去。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通过转变经济运行机制，开始解决了供需衔接使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这一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首要问题，生产者面向市场，以销定产，从而出现了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的可喜竞争现象；通过采取一系列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大大提高了农业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因而在主要农产品的种植面积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产量和单位面积生产率却大大提高了；通过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工业生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以往长期存在的工业消费品供应紧张状况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缓和；通过价格信号的改善和财政、金融政策的引导，投资者开始注重中长期经济效益，投资结构有所改善，中央重点项目特别是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投资比重上升，稳住了中长期经济效益提高的大局。部门、地方对于企业更新改造较前重视，用于这方面的投资比重上升，也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中，逐渐在观念认识上和决策思路上实现了三个结合：第一，逐步明确了改革的紧迫性和长期性的结合。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传统经济体制不改革不行，对改革的紧迫感日益加深；同时又日益认识到改革不可能是一次行动就能成功，而是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在经济改

革上不可能“一步到位”或不切实际地要求“加快过渡”，而是要在不失时机、持续改革的基础上，作好“过五关、斩六将”比较长期的打算。第二，逐步明确了改革的分项有序性和配套性的结合。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同时对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时，各方面的改革不可能互相割裂地单独成功，也不可能完全齐头并进，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既按轻、重、缓、急有意识地加以优化分离，又分项有序地、按客观联系的要求进行有机配套，以形成渐进式加小配套的转轨方式，即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在各个阶段则尽可能在相互联系的某些方面使改革衔接配套，以减少改革过程中的摩擦与震荡。第三，逐步明确了利益调整、利益刺激和利益约束的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调整利益关系、运用利益刺激起步的，不论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城市改革企业工资和奖金制度，还是在城乡基本经济单位特别是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在企业基金、税后利润、折旧基金留成等方面，都给基本经济单位以实际的利益，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单纯利润刺激造成了企业只能负盈不能负亏，又助长了收入攀比，使人们对利益刺激总感到不满足。在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经济改革不是简单的利益调整，也不是片面地给人们以现实利益或预期利益的刺激，而是给人们以平等机会进行竞争，在成功与利益、失败同惩罚联系起来的基础上给人们以利益约束。在改革中，取得真正成功的单位，应当不是简单地靠片面的利益刺激，而是靠增强奖罚对称的利益约束。

这个时期的工作证明，处理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关系是一项复杂的领导艺术。当国民经济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况时，发展模式的适当转变是体制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1978年我国经

济正处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党中央不失时机地做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并把调整放在首位的战略决策。经过农村改革的率先起步和整个经济的有效调整，促进了城市改革的由点向面的发展。1985年，我国经济又处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态势中，党中央当机立断提出了加强宏观控制，并于1986年采取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经过适时的降速，为改革进一步深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在前进过程中经常面临发展和改革谁摆在首位的两种选择。实践证明，合理的选择原则是：经济发展在短期内服从于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从长期上服务于经济发展，这样可以保证在总体上处理好发展和改革的关系。

（三）前进中存在的问题

这10年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前进中的问题，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和经济体制模式转换都还刚刚开始，正处于新旧两种模式交替并存的阶段，不能不遇到转换过程中的种种摩擦和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下3个问题。

第一，国民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传统发展模式 and 传统体制模式中存在的普遍的扩张冲动和有限的供给增长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我们。到1988年底，国民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总量矛盾突出表现为：财政严重赤字，银行信贷规模偏大，物价水平的上涨难以控制。

由此造成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另一方面是不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从经济发展来看，如果和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发展起伏波动相比，这几年在年度间波动幅度已经比过去小得多，波动时间也比过去短

得多。但是从1979年到1981年，1984年底到1986年以及1986年底到1988年的三次涨落来看，特别是从季度、月份之间来看，经济发展的起伏波动还是不小的。实践说明，每当控制不住投资需求的膨胀以及由此带动的消费膨胀，虽然短时间里会出现经济高速增大的势头，但是靠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前发行支撑的需求增长脱离了国力，没有相应的供给来保证。过一段时间便要进行调整，不得不采用基建下马等强制手段压缩需求，实行经济调整，使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这样在片面追求规模、速度造成经济发展起伏波动的时候，总的经济增大速度反而是低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讲，各方面想办的事情很多，只有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把“馅饼”做得大些，才能过得去。也正因为这样，当出现需求膨胀时要不要压缩需求，往往会有种种不同见解。但是，今天不小压，明天就要大压。只有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注意避免需求的过分膨胀，力争经济稳定发展，从长期来看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才会是较高的。

前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在总需求与总供给不那么平衡，经济环境不那么宽松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的确不能等出现稳定的宽松环境之后再着手改革，那样不符合群众迫切要求改革的心愿。但另一方面，在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往往会产生种种摩擦，效果不好。前一时期的价格改革是在国民收入超分配，货币供应量偏多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一方面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因需求过大而引起物价的过度上涨，反过来又阻碍价格体系的进一步理顺。所以，改革和改革的环境虽然是互为因果的连环套，对投资承担风险责任的自我约束机制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才能最终形成。但在经济不稳定中要周期地进行较大的经济调

整，经济改革往往进两步退一步，使改革成为旷日持久的事情。因而控制需求膨胀，缩小并力争消除国民收入的超分配，争取有一个相对较好的改革环境，是我们经常应该注意的事情。

第二，还没有真正解决传统经济模式中经济效益普遍低下的问题。在农村，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整个农村的经济资源的利用并不理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关系到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益，而价格不合理限制了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普遍的分散经营又使得农村中还没有把规模经济效益提上议事日程，农民对农业生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农田水利设施和大中型农机具破坏多而建设少。在城市工业中，还是重产值增长，轻效益提高，不惜以高投入来保产值，造成种种浪费；能源上去了而加工工业上得更快，因缺电和缺运力而限制生产潜力发挥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性改变；产品质量提高和品种变化赶不上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技术改造的技术进步赶不上技术陈旧的速度；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还相当差；外贸亏损居高不下，换汇成本不断上升。更为重要的是，从中长期的发展来看，由于不注重投资质量，特别是不注重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在结构转换中的作用，将会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反映经济效益的几种重要指标呈现了相反的走势。从人均国民收入看，这几年增长速度是快的，说明了“馅饼”做大了，宏观经济效益是好的。但是工业产值利税率则趋于下降，近年来只有历史最高水平的2/3，反映了经济效益并不好。这种相反的走势告诉我们的是：（1）这几年调整经济结构，轻工业比重上升，使宏观经济效益呈上升趋势，但经济结构调整还没有向深层发展，又限制了效益的进一步提高；（2）工业产值利税率的下降，既反映企业经营管理还比较差，又有

着原材料提价和产值增长中有重复计算水分等因素，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年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快于产值增长。1984—1988年工业产值增长快的年度为18%，低的年度为9.2%，而这4年工业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增长年年都在20%或20%以上，工资显著上升，造成产值利税率下降，从财政角度看当然是经济效益下降了。因此，单靠减税让利来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了，促使企业在改善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增加留利，争取实现产值、国民收入、上交税利三者相适应的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转换时期中出现的摩擦，有可能使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步上与提高经济效益相反的方向。例如，原材料紧缺，会诱发企业增加库存；在指标环比考核或交税基数环比上升的规定下，企业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提高利润率，而是以外延方式扩大生产来增加利润量；在出现卖方市场的环境下，短缺没有成为促使企业发展创新的机会，反而成为质量和效益下降的诱因；重产值轻效益本来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由于产值增长迄今仍是考核成绩、选拔干部的依据和标准，当某些企业、部门和地区产值超计划高速增长受到表扬奖励时，也促进了大家对产值速度的相互攀比，而提高经济效益则未引起普遍重视。出现这些情况，说明在前进中尚有问题，也说明只要我们有正确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好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换中的问题，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的。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中没有解决好搞活企业和改善经济运行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经济改革。然而，

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都与没有完成体制模式的转换密切相关。体制模式转换没有取得更快的进展以及在转换体制模式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重新构造微观基础与改善运行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几年，我们通过简政放权改善了企业与其领导单位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实行利润留成、利润包干以及利改税等措施使企业有了自己的财权和财力，企业比过去活些了。与此同时，通过价格改革使价格扭曲的状况有所改善，流通渠道比过去通畅，生产资料开始进入市场，还调整了税率、利率、汇率等，改善了在经济运行中利用市场机制的外部条件。这使得企业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利润动机有所增强。但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还缺乏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的机制，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意识不强，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适应能力差，出现了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倾向，企业只能负盈不能负亏的问题开始突出。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改革企业经营的内部机制和改善企业经营的外部条件，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二者不能偏废。但是从当前来说，则主要是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没有转换，对企业放了权、让了利，却并没有使企业担负起相应的经济责任，因而需要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思路，重新构造微观基础，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具有既负盈又负亏的经营机制。这将会提高企业对市场变化和宏观控制参数反应的灵敏度，推动已经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间接调控手段发挥作用，再相应改善市场和宏观管理机制，就可以进一步推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深化，这就有可能把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四）下一步改革的目标

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更高水平的历史转折点

上。我们必须以新的眼界和更大的努力来抓住历史赋予我们的良机，坚持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把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换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今后的国民经济工作中，我们应当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求得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以利于体制模式的平稳转轨。在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转轨过程中，经济活动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社会生产过程也会出现某种不确定性，国民经济在客观上有时难以稳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实现稳定经济和造成宽松的经济环境的努力。在稳定经济方面，从短期看，关键仍然在于控制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造成的总需求膨胀和物价上涨。总供给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特别是供给结构的改变本身也存在着或长或短的时滞。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把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重点放在控制总需求的膨胀上，尽管在控制总需求时有可能影响总供给的增加，但不应当以此为借口来反对对经济过热的控制。当然，我们要尽量提高经济控制的艺术，避免因反应过度而造成经济不正常的萎缩。其次，我们也不能忽视总供给的增加。交通运输和能源（电力）仍是制约生产能力发挥和供给增长的“瓶颈”，仍然要切实抓好；农业方面，1984年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已经发出了“警告”信号，若不重视粮农利益的保障和新的投入，我国经济发展将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当然在刺激总供给增加时不能诱导总需求的膨胀，否则就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新的不平衡。由于目前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过程之中，导致需求膨胀的因素既和中央财政预算有关，也和地方、部门、企业有关。因此需要针对新的情况改进控制的艺术和方法，不但要压缩需求，实现现阶段的经济稳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经济的短期稳定

同长期稳定统一起来，争取长期、高效、稳定地发展。

坚持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一切从提高经济效益出发来安排生产和建设。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其具体标志是城镇大量青年待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展也相当快，这就为从数量型增长转向效益型增长提供了较前有利的条件。因而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统一了认识之后，要有相应的政策特别是改革配套措施跟上去。当前特别要注意进一步缓解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并力促国民经济结构转换。这里的关键，首先是要以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中长期投资质量为核心，推动整个经济结构进步。其次是要加强短线产业和基础结构的建设，并尽可能促使生活资料生产能力同新的、更高收入水平的消费结构相适应，把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同生产结构之间的断层弥补起来。再次是要尽快制定出包括带头产业、优先发展产业、支柱产业、创汇产业等在内的完整有效的产业政策，并与进出口政策相结合，规划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有先有后、有张有弛地在保证以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工业化、深加工化和服务化。

在整个经济改革中，应当以重新塑造微观经济基础为中心环节，处理好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形成和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转换的关系。几年来改革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经济改革以搞活企业这一基本经济单位为中心环节的正确性。当前整个国民经济和经济改革的形势又迫切地要求我们在现阶段坚定不移地把深化企业改革放在整个经济改革舞台的中心。农村经济在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农民向农业投资的意识不旺，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国家和地方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调动广大农民增加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并在完善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发挥规模效益，相应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更大规模地把农村的生产潜力释放出来，从而使农村经济更加稳定发展，并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经济发展和改革面临的困难，也需要围绕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为中心，对经济参数、市场体系、运行机制、控制手段进行配套改革，以求得城市经济改革的实质性进展。这样，可以把蕴藏在国营经济内的巨大生产潜力迅速地释放出来，从而为各方面的后续改革奠定可靠的基础。

为了深化企业体制改革，第一，要把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从放权让利转变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上来。我国10年来企业改革的经验表明：以放权让利为起步进行改革，使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继续按照这条思路进行企业改革，只能改变利益再分配而不能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并且在让权时就播下了收权的种子。另一方面，从现代经济发展来看，生产社会化已经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成为一种趋势。因此，以两权分离为原则，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开入手搞活企业，这是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第二，在当前搞活企业这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中，要把转变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作为企业改革主攻方向。农村第一步改革时，外部经营条件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但以生产队内部经营机制的转变为主攻方向，一举就解决了农村吃“大锅饭”的弊病。在城市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关键也在于要实现责、权、利的真正统一和密切结合，才能使其成为一个不仅有权、有利，而且对其经营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就是说，正确地把握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这个主攻方向，是当前搞活企业的关键。第三，转变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同改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要相互衔接，要同市场体